

中国文化史



高等教育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在中国文化的四个层面中更注重观念层面及其物化形态的叙述,以“小文化”为主线,加强文化发展的阶段性归纳,彰显每一历史阶段的文化主潮。把中国文化与其他文化的互动历程作为一条重要线索,凸现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地位;采用文化生态论、特质论等相关理论,增补夏商周断代工程、郭店楚简研究等新成果;体例新颖,化繁为简,便于教学。本书适于高校文科通识课及历史学专业课教学使用。

摇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摇中国文化史轶天瑜,杨华,任放编著援-北京:高

等教育出版社, 圆国圆年圆月

搖陽星苑 園原園翳熙員

摇 I 援中援魏 魏 II 援①冯援魏②杨援魏③任援魏 III 援攸化

史—中国—高等学校—教材—援云环境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50000 号

策划编辑 于健航 责任编辑 于健航 封面设计 刘晓翔

版式设计 张 岩 责任校对 俞声佳 责任印制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购书热线 010-58581000 园园 远隔山海 志同

社摇摇址摇摇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源号摇

免费咨询摇愿园-愿园-园缘愿

邮政编码

网摇摇址摇漂表:轱曾雷琛蒙郅陈邕糖社

总摇摇机摇摇园园-缘缘园园园

漢表: 韓曾雷陳蔡鄭賈自國賈

经摇摇销摇摇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摇摇刷摇摇

开摇摇本摇摇苑苑伊伊题题摇摇员员最最程程

印摇摇张摇摇员

版摇摇次摇摇摇年摇月第 员版

字摇摇数摇摇猿园园园

印摇摇次摇摇摇年摇月第摇次印刷

插摇摇页摇缘

定摇摇价摇摇圆肆圆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料号: 10000000000000000000

目 录

导论	员
一、释“中国”	员
二、释“中华民族”	远
三、释“文化”·“文明”	怨
四、文化史的研究对象	员猿
五、中国文化的生态环境	员源
六、中国文化特质	圆
七、中国文化的世界地位	圆
八、中国文化史分期	圆
 第一章 中国文化的发祥	猿
一、中国人的起源	猿
二、原始农业与畜牧业	猿
三、初民的精神世界和文化生活	猿
四、传统视野中的“黄金时代”	源
 第二章 青铜时代	源
一、文明的初现	源
二、青铜器及三代的物质文明	缘
三、文字的早期形态	缘
四、三代的天命观念和人文传统	缘
五、礼乐制度与社会生活	缘
 第三章 元典时代文化的多元走向	远
一、春秋战国之际的文化变革	远
二、士的崛起与私学的出现	远
三、百家争鸣与元典创制	远
四、出土简帛与先秦学术	猿
五、尊君重民的政治伦理	猿

摇六、先秦时期的区域文化	苑怨
第四章 帝国时代的文化大一统	愿源
摇一、专制帝国的文化模式	愿源
摇二、汉文化对秦、楚文化的继承	愿愿
摇三、秦汉帝国的国家意识形态	怨圆
摇四、经学与经今古文之争	怨缘
摇五、帝国文化的固守和外拓	怨怨
摇六、佛教传入和道教创立	员圆
摇七、文史创作和科技成就	员缘
第五章 胡汉、中印文化的融合	员园
摇一、魏晋之际的文化变革	员园
摇二、玄学与魏晋风度	员源
摇三、胡、汉文化的融合互补	员远
摇四、南、北文化的差异与整合	员怨
摇五、佛教华化与三教共弘	员猿
摇六、隋唐盛世与东西方文化交流	员愿
摇七、科举制度	员缘
摇八、文史自觉	员愿
第六章 近古文化的定型	员源
摇一、唐中叶的文化转折	员源
摇二、渗透禅机的新儒学——理学	员苑
摇三、文化的雅化	员源
摇四、俗文化的展开	员员
摇五、文官政治的确立	员猿
摇六、文化中心的南移	员远
第七章 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碰撞	员怨
摇一、辽、夏、金、元 征服与被征服的二律背反	员怨
摇二、帝国体制下的中西文化交流	员圆
摇三、元曲的兴盛	员源
摇四、领先世界的科技成就	员怨

第八章 晚期帝国文化	园苑
摇一、古典文化的集成	园苑
摇二、极端皇权与文化专制	园猿
摇三、理学的嬗变	园缘
摇四、启蒙新声	园员
摇五、耶稣会士来华及东西方文化交流	园缘
摇六、郑和七下西洋与“迁海令”	园员
摇七、市井口味与小说丰收	园圆
第九章 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型	园愿
摇一、经世实学	园愿
摇二、兴办“洋务”与“中体西用”模式	园猿
摇三、近代文教机构的兴办与知识分子形成	园愿
摇四、从“维新”到“革命”	园员
摇五、五四狂 _感	园圆
摇六、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其中国化	园缘
摇七、文化论争	园愿
摇八、汉字改革	园圆
摇九、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园缘
结语 中国文化的发展节奏与去向	园愿
插图资料来源	园圆
后记	园缘

导 论 //

中国文化史,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创造文化的历史,中国文化与外域文化的交互关系,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如果将中国文化史比喻为波澜壮阔、起伏跌宕的多幕戏剧,“中国”便是演出舞台,“中华民族”是演出主体,“文化”是演出内容。我们研习中国文化史,应当了解舞台、主体和内容。“中国”、“民族”、“文化”、“文明”都是汉语古典词,然而其内涵在近现代发生了深刻的演变。这种演变正是文化的古今更革、中西交汇的产物,诚如陈寅恪 1929 年在《致沈兼士》中所云:“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诠释“中国”、“文化”等语,进而考辨中国文化的生态环境、基本特性和历史分期,是研习中国文化史的入门之径。

一、释“中国”

作为中国文化演出舞台的“中国”,是一个耳熟能详的词语,然而,其内涵却经历了曲折的流变:从古代的天下中心之义,演变为近代的与世界列邦并存的民族国家之名。

中国之“中”,甲骨文、金文像“有旒之旒”(有飘饰的旗帜),士众围绕“中”(旗帜)以听命,故“中”又引义为空间上的中央,谓左右之间,或四方之内核;又申发为文化或政治上的枢机、轴心地带,所谓“当轴处中”。

中国之“国”,繁体作“國”,殷墟甲骨文尚无此字,周初金文出现“或”及“國”字,指城邑。《说文》:“邑,國也,从口”,原指城邑。古代的城,首先是军事堡垒,“口”(音围)表示城垣,其内的“戈”表示武装,引申为武装保卫的天子之都,以及诸侯辖区、城中、郊内等义。

综论之,“中”指居中集众之旗,引申为中心、中央;“国”指执戈捍卫之城,进而指称军事、政治中心地。“中国”以整词出现,较早见于周初,如青铜器《何尊》铭辞^①、最早的传世文献《尚书·周书》^②均有用例,《诗经》、《左传》、《孟子》等先秦典籍也多用此词。

“中国”初义是“中央之城”,即周天子所居京师(首都),与“四方”对称,如

① 《何尊》记周武王克商,廷告上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辟民。”参见于省吾《释中国》,载《中华学术论集》,中华书局 1985 年版。

② 《尚书·周书·梓材》追述周成王说:“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

《诗经·大雅·民劳》云：“民亦劳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毛传释曰：“中国，京师也。”《孟子·万章》云：“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这些用例的“中国”，均指居天下之中的都城，即京师，诚如刘熙为《孟子》作注所说：“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

初义京师的“中国”又有多种引申，一如诸夏列邦，即黄河中下游这一文明早慧、国家早成的中原地带，居“四夷”之中^①；二如国境之内^②；三如中等之国^③；四如中央之国^④，等等。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是与“四夷”对称的诸夏列邦之义的“中国”，如三国时，诸葛亮对孙权说：“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⑤唐朝的韩愈在《论佛骨表》中云：“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后汉时流入中国，上古未尝有也。”^⑥这些“中国”，皆指四夷万邦环绕的中原核心地带。其近义词则有中土、中原、中州、中夏、中华等等。

古人心目中的世界，形态为“天圆地方”，所谓“中国”，是以王城（或称王畿）为核心，以五服（甸、侯、宾、要、荒）或九服（侯、甸、男、采、卫、蛮、夷、镇、藩）为外缘的方形领域^⑦，作“回”字状向外逐层延展，中心明确而边缘模糊。在春秋时期，约含黄河中下游及淮河流域，秦、楚、吴、越等尚不在其内，但后来这些边裔诸侯强大起来，便要“问鼎中原”，试图主宰“中国”事务。至战国晚期，七国都纳入“中国”范围，《荀子》、《战国策》诸书所论“中国”，已包含秦、楚、吴、越等地。秦一统天下后，“中国”范围更扩展至长城以南、临洮（今甘肃）以东的广大区间，《汉书·西域传》说：“及秦始皇攘却戎狄，筑长城，界中国，然西不过临洮。”汉唐以降，“中国”的涵盖范围在空间上又有所拓宽。

自晚周以降，“中国”一词还从地理中心、政治中心含义派生出文化中心含义。战国时赵公子成的论述颇有代表性：

中国者，盖聪明徇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能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⑧

与公子成论战的赵武灵王则指出，夷狄也拥有可资学习的文化长处，如“胡服骑射”便于作战，中原人应当借取。这又给“中国”的文化含义赋予了某种

① 《诗·小雅·六月》序：“四夷交侵，中国微矣。”

② 《诗·大雅·荡》：“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炁然于中国，斂怨以为德。”《穀梁传·昭公三十年》注：“‘中国’，犹国中也。”

③ 《管子》按大小排列，将国家分为王国、敌国、中国、小国。

④ 《列子》按方位排列，将国家分为南国、北国、中国。

⑤ 《三国志》卷五十八《蜀书·诸葛亮传》

⑥ 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00 页。

⑦ “五服”见《国语·周语》，“九服”见《周礼·夏官·职方氏》。

⑧ 《史记》卷一百一十五《赵世家》。

开放色彩。

古人还意识到文化中心是可以转移的，故“中国”与“夷狄”往往发生互换，所谓“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①。明清之际哲人王夫之在《读通鉴论》、《思问录》等著作中，对“中国”与“夷狄”之间文野地位的更替，作过深刻论述，用唐以来先进的中原渐趋衰落，蛮荒的南方迎头赶上的事实，证明华夷可以变易，“中国”地位的取得与保有，并非天造地设，而是依文化先进区不断流变而有所迁衍，诚如《思问录·外篇》所说：“天地之气，衰旺彼此迭相易也。”

秦汉帝国建立后，“中国”领域放大，包括东南至于海、西北达于流沙的朝廷管辖的广阔区间。历代中国王朝版图多有伸缩，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大体奠定中国疆域范围，北起萨彦岭，南至南海诸岛，西起帕米尔高原，东极库页岛，约1300万平方公里。19世纪中叶以后，西东列强攫取中国大片领土，由于中国人民的英勇抵抗，才使领土避免更大损失。今日中国面积960万平方公里，仅次于俄罗斯、加拿大，居世界第三位。

我国古代多以朝代作国名（如汉代称“汉”、“大汉”，唐代称“唐国”、“大唐”，清代称“清国”、“大清”）。外人也往往以我国历史上强盛的王朝（如秦、汉、唐）或当时的王朝相称。如日本长期称中国人为“秦人”，称中国为“汉土”、“唐土”，江户时称中国人为“明人”、“清人”。此外，印度称中国为“支那”，意谓“文物之国”；希腊、罗马称中国为“赛里丝”，意谓“丝国”。

以“中国”为非正式的国名，与异域外邦相对称，首见于《史记·大宛列传》，该传载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这种以“中国”为世界诸国中并列一员的用法，汉唐间还有例证，如《后汉书·西域传》以“中国”与“天竺”（印度）并称；《唐会要·大秦寺》以“中国”与“波斯”（伊朗）、“大秦”（罗马）并称。但这种用例以后并不多见。一个朝代自称“中国”，始于元朝。元世祖忽必烈派往日本的使臣所持国书，称自国为“中国”，将日本、高丽、安南、缅甸等邻邦列名“外夷”^②。明清沿袭此种“内中外夷”的华夷世界观，有时也在这一意义上使用“中国”一词，但仍未以之作为正式国名。

“中国”作为与外国对等的国体概念，萌发于宋代。汉唐时中原王朝与周边维持着宗主对藩属的册封关系和贡赋关系，中原王朝并未以对等观念处理周边问题。赵宋则不然，北疆出现了与之对峙的契丹及党项羌族建立的王朝——辽与西夏，这已是两个典章制度完备、自创文字，并且称帝的国家，又与赵宋长期处于战争状态，宋朝还一再吃败仗，以致每岁纳币，只得放下天朝上国的架子，以对等

① 韩愈：《原道》，前引《韩愈全集校注》，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44页。

② 《元史》卷132《外夷传一》。

的国与国关系处理与辽及西夏事务,故宋人所用“中国”一词,便具有较清晰的国体意味。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北宋理学家石介著《中国论》,此为首次出现的以“中国”作题的文章,该文称,“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这已经有了国家疆界的分野,没有继续陶醉于“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虚幻情景之中,“中国”便从文化主义的词语,变为接近国体意义的词语。当然,国体意义上的“中国”概念,是在与近代欧洲国家建立条约关系时正式出现的。

欧洲自15世纪开始形成“民族国家”(nation-state),并以其为单位建立近代意义上的国际秩序。清政府虽然对此并无自觉认识,却因在客观上与这种全然不同于周边藩属的西方民族国家打交道,而需要以一正式国名与之相对,“中国”便为首选。这种国际关系最先发生在清一俄之间。沙皇俄国以哥萨克铁骑东扩,在黑龙江上游与康熙皇帝时(1689—1689)的清朝军队遭遇,争战后双方于1689年签订《尼布楚条约》,条约开首以满文书写清朝使臣职衔,译成汉文是:“中国大皇帝钦差分界大臣领侍卫大臣议政大臣索额图”,与后文的“斡罗斯(俄罗斯)御前大臣戈洛文”相对应。康熙朝敕修《平定罗刹方略界碑文》,言及边界,有“将流入黑龙江之额尔古纳河为界,河之南岸属于中国,河之北岸属于鄂罗斯”等语,“中国”是与“鄂罗斯”(俄罗斯)相对应的国名。

如果说,17世纪末叶与俄罗斯建立条约关系还是个个别事例,此后清政府仍在“华夷秩序”框架内处理外务,那么,至18世纪中叶,西方殖民主义列强打开清朝封闭的国门,古典的“华夷秩序”被近代的“世界国家秩序”所取代,“中国”愈益普遍地作为与外国对等的国名使用,其“居四夷之中”的含义逐渐淡化。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中英两国来往照会公文,言及中方,有“大清”、“中华”、“中国”等多种提法,而“中国”用例较多。如林则徐《拟谕英吉利国王檄》说:“中国所行于外国者,无一非利人之物”,以“中国”与“外国”对举。与英方谈判的清朝全权大臣伊里布《致英帅书》,称自国为“中国”,与“大英”、“贵国”对应,文中有“贵国所愿者通商,中国所愿者收税”之类句式。英国钦奉全权公使璞鼎查发布的告示中,将“极东之中国”与“自极西边来”的“英吉利国”相对应,文中多次出现“中国皇帝”、“中国官宪”、“中国大臣”^①等名目。而汉文“中国”正式写进外交文书,首见于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1842年8月29日)签署的中英《江宁条约》(通称《南京条约》),该条约既有“大清”与“大英”的对称,又有“中国”与“英国”的对称,并多次出现“中国官方”、“中国商人”的提法^②。此后清朝多以“中国”名义与外国签订条约,如中美《望厦条约》以“中国”对应“合众国”,以

① 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神州国光社1957年版,第1册,第1页。

②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页。

“中国民人”对应“合众国民人”^①。

古代中原人常在“居天下之中”意义上称自国为“中国”，但也有见识卓异者发现，“中国”并非我国的专称，异域也有自视“中国”的。曾西行印度的东晋高僧法显说，印度人以为恒河中游一带居于大地中央，称之为“中国”^②。明末来华的耶稣会士利玛窦、艾儒略等带来世界地图和五洲四洋观念，改变了部分士人的中央意识，使之省悟到，“按图而论，中国居亚细亚十之一，亚细亚又居天下五之一，……戈戈持此一方，胥天下而尽斥为蛮貉，得无纷井底蛙之诮乎。”^③清人魏源接触到更翔实的世界地理知识，认识到：“释氏皆以印度为中国，他方为边地。……天主教则以如德亚为中国，而回教以天方国为中国。”^④近代学人皮嘉佑在《醒世歌》中说：“若把地球来参详，地球本是浑圆物，谁是中央谁四旁？”这都是对传统的“中国者，天下之中也”观念的理性反思与修正。

近代中国面临西东列强侵略的威胁，经济及社会生活又日益纳入世界统一市场，那种在封闭环境中形成的虚骄的“中国者，天下之中”观念已日显其弊，具有近代意义的“民族国家”意识应运而生，以争取平等的国家关系和公正的国际秩序。而一个国家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拥有一个恰当的国名至关重要，“中国”作为流传久远、妇孺尽知的简练称号，当然被朝野所袭用。梁启超、汪康年等力主，应当扬弃“中国者，天下之中也”的妄见，但“中国”这个自古相沿的名称可以继续使用，以遵从传统习惯，激发国民精神。他们指出，以约定俗成的专词作国名，是世界通则，西洋、东洋皆不乏其例^⑤。而近代兴起的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运动，更赋予“中国”以爱国主义内涵，“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非外人所得而干涉也”^⑥，便是在近代民族国家意义上呼唤“中国”，这已经成为国民共识。如果说，“大清”和“中国”在清末曾并列国名，交替使用，那么，辛亥革命以后，“中国”便先后作为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以正式国名被国人共用，并为国际社会普遍认可。

本书在全面观照“中国”的古典义和现代义及二者的因革转化的基础上，使用“中国”一词。“中国文化史”正是在作为历史范畴的“中国”这一逐步扩展并定位的空间，得以生发、演绎的。

①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56—157页。

② 法显：《佛国记》，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127页。

③ 瞿式谷：《职方外纪小言》。

④ 《海国图志》卷79。

⑤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汪治年编《汪穉卿先生遗文》：“吾国古来自称中国，对于四夷言之也。……盖名称之源于古者，或不免有所错误，而承袭既久，安能革之。即西人之各种名称，似此者多矣。安能一一革之乎。又如日本二字，今日核之于理，岂有当乎。”杭州汪氏1955年版，第156页。

⑥ 《论中国之前途及国民应尽之责任》，《湖北学生界》第1期（1915年1月）。

二、释“中华民族”

在中国这片广袤、丰腴的大地上生活劳作的各族人民，统称中华民族。

民族，泛指历史上形成的、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各种人群共同体。从时序划分，有原始民族、古代民族、现代民族。中国古籍表述这一概念的有“民”、“族”、“种”、“部”、“类”等单字词，也有“族类”、“族部”、“民群”、“民种”等双字词。其核心单字词“族”，原义“矢锋”（箭头），引申为众。《说文》曰：“族，矢锋也，束之族族也。……众矢之所集。”集合义的“族”，演为具有相似属性的人群集合的专称。中国自古注重族群文化心理的同一性，《左传·成公四年》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即此之谓。

古汉语的“族”、“族类”，是区分“内华夏、外夷狄”的旧式民族主义概念，而双音节的“民族”一词，乃是近代民族主义概念，以往多认为是从日本输入的。作为单一族群的日本人，在前近代已完整地具备民族诸要素（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语文、共同心理），故西方近代民族主义传入日本，迅速得以风行。明治时期，日本学者将“民”与“族”组合成“民族”一词，对译英语 *nationality*。19世纪之交，经中国留日学生和政治流亡者将这一术语传入中国。故清末使用“民族”一词的学人，多有游日经历。然而，考索词源，“民族”作为整词出现，并非始于日本。早在 19 世纪上半叶，入华西方新教传教士、日耳曼人郭实腊等编辑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道光十七年（1837）九月号载《约书亚降迦南国》，已创译“以色列民族”一语，此为汉字整词“民族”的较早出现。咸丰、同治间文士王韬 1868 年所著《洋务在用其所长》也出现“民族”一词。上述两例均在日制汉字词“民族”之前，但属于零星个案，并未产生影响。至清代末叶，伴随着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勃兴，日制“民族”一词传入中国，逐渐为人使用，如 1895 年第二号《强学报》、1895 年《时务报》皆有例证。1895 年 7 月，康有为给光绪皇帝上《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揭》，有“民族之治”一语。1895 年，章太炎《序种性》有“自帝系世本推迹民族”^①的论说。此后，梁启超《东籍月旦》（1898）、吴汝纶《东游丛录》（1898）都使用“民族”一词，梁启超在《新民说·论自由》中更强调：“今日吾中国最急者……民族建国问题而已。”提出建立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任务，其内容有“完备政府”、“谋公益”、“御他族”等等。当然，多民族的中国较之单一民族的日本，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的情况复杂得多。就清末而言，首先面临满洲贵族对数量巨大的汉族的民族压迫问题。孙中山 1894 年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中便是以此为症结议论“民族”的。1895 年他在《民报·发刊词》中对

① 《检论·序种姓上》，《章太炎全集》第 3 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45 页。

“民族”和“民族主义”又作系统阐发，虽有“排满”之议，却又有更宏阔的视野，并与西方近代民族主义对接。辛亥革命后，民族主义超越“排满”，成为争取全中国诸民族共同权益，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新思想。旧式民族主义正式向近代民族主义过渡，“民族”一词自此广泛使用，成为常用汉字词。

“中华”是“中国”与“华夏”的复合词之简称，较早出现于华夷混融的魏晋南北朝，《魏书》、《晋书》多有用例^①。“华”通“花”，意谓文化灿烂，所谓中国“有服章之美，故谓之华”^②。华夏先民建国黄河中游，自认中央，且又文化发达，故称“中华”。《唐律名例疏议释义》说：

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义，故谓之中华。

所论“中华”，已淡化地理方位的中心性，突出文化上的先进性。1368年，朱元璋命徐达北伐讨元，其檄文有“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著名口号，这种与“胡虏”对称的“中华”，指汉族及汉文化传统。至近代，“中华”则逐渐成为指认全中国的一种文化符号。梁启超1900年著《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有如下句式：

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

盖大地今日只有两文明：一泰西文明，欧美是也；二泰东文明，中华是也。

这是在中国文化的一贯性上指认“中华”的。

由“民族”与“中华”组成的复合词“中华民族”，出于晚清，曾与“中国民族”同位并用。梁启超1900年在上引同文中，首用“中华民族”一词，联系上下文，是指在中国土地上的诸族之总称。此前在1895年，梁氏《中国史叙论》中多次出现“中国民族”，也指历来生息于中国的诸族总称。1905年孙中山组建同盟会，其誓词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一语，是对朱元璋讨元檄文口号的袭用。与此同时，章太炎在《中华民国解》中使用“中华民族”一词。孙、章此间所说“中华”和“中华民族”，均指汉族，这与革命派推翻满洲贵族统治的政治目标相关。而与章氏的“排满革命”展开论辩的立宪派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中则从中国诸族文化共同性出发，论述“中华”和“中华民族”：

则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不以血统言，可决之也。故欲知

① 《魏书·礼志》：“下迄魏晋，赵秦二燕，虽地处中华，德祚微浅。”《魏书·宕昌传》也有用例。《晋书·刘乔传》：“今边陲无备豫之储，中华有杼轴之困。”

② 《左传·定公十年》：“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孔颖达疏：“中国有礼义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中华民族为何等民族,则于其民族命名之顷,而已含定义于其中。与西人学说拟之,实采合于文化说,而背于血统说。华为花之原字,以花为名,其以之形容文化之美,而非以之状态血统之奇^①。

此论扬弃民族的体质人类学标准,而取文化人类学标准,超越肤色、形貌等血统、种族属性,从创造共同文化、形成共同心理这一关节点上阐明“中华民族”精义。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倡言“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②,此即“五族共和”说。1912年猿月黄兴等成立“中华民国民族大同会”,不久改称“中华民族大同会”,孙中山盛赞该会“提携五族共路文明之域”的宗旨^③。李大钊1915年著《新中华民族主义》,主张对古老的中华民族“更生再造”,在中国诸族融合的基础上形成“新中华民族”。孙中山1924年著《三民主义》,阐述新的民族主义:汉族“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于诚,合为一炉而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孙氏晚年力主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④。总之,经过近代以来历史进步的长期熏染,“中华民族”的含义确定为中国诸族之总称,对内强调民族平等,对外力争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现在人们普遍在这一意义上使用“中华民族”一词。

“中华民族”既有悠远深邃的历史渊源,又在近代民族国家竞存的世界环境中得以正式铸造,费孝通指出: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⑤。

在近代,逐步走出封闭状态的国人,面对西东列强进逼的世界格局,民族国家观念觉醒,这种观念既受启迪于世界新思潮,又深植于中国诸族在数千年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共同命运和近似文化心理,诚如梁启超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中所说:

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人”之一观念浮于其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一员也。

中国历来是多民族国家,自古居于中原的华夏——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长期互动共存。历史上影响较大的少数民族,东北有乌桓、鲜卑、高丽、室韦、契丹、女真等,北方有匈奴、乌孙、突厥、回纥、蒙古等,西南有氐羌、吐谷浑、吐蕃、西南夷,南方有武陵蛮、僚、瑶、苗、黎等。经长期的民族融合、民族迁徙,形成中国境

① 《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0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页。

③ 1912年猿月猿日《临时政府公报》第125号。

④ 《孙中山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5页。

⑤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2年版,第14页。

内今之诸族，合为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呈“多元一体格局”，“它所包括的五十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①。多元中的统一，统一中的多元，使得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和现实格局色彩缤纷、生机勃勃，在多样性中保持强劲的凝聚力。

今之中华民族是中国境内 56 个民族的总称，其中汉族占总人口的 92%，构成中华民族的主体，多聚居于黄河、长江、珠江流域和松辽平原，使用汉藏语系的汉语、形意文字的汉字。其他民族多生活在东北、北、西北、西南地区，分布区域约占全国总面积的 38%~40%，主要分属汉藏语系和阿尔泰语系，人口百万以上的 16 个：壮、回、维吾尔、彝、苗、藏、满、蒙古、布依、土家、哈尼、哈萨克、傣、朝鲜、瑶、侗、白族；人口百万以下、十万以上的 16 个：黎、傈僳、东乡、佤、畲、高山、拉祜、水、纳西、景颇、柯尔克孜、达斡尔、仫佬、羌、仡佬、锡伯、土族；人口十万以下、一万以上的 15 个：乌孜别克、俄罗斯、保安、裕固、京、布朗、撒拉、毛难、阿昌、普米、塔吉克、怒、鄂温克、崩龙、基诺族；人口万人以下的 20 个：塔塔尔、门巴、独龙、鄂伦春、赫哲、珞巴族。

民族是历史范畴，有其发生、发展、消亡的过程。汉族由在夏、商、周三代形成的华夏族与周边诸族融合而成，汉代以后渐称“汉人”、“汉族”，并继续与诸族融合。其他诸族也是如此，如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壮族，是古代百越各支经长期演化而来，史称“西瓯”、“骆越”、“乌浒”、“僚”等，与汉族交流频繁，后总称“僮”，1958 年改称壮族。满族的先世为东北的肃慎、挹娄、勿吉、靺鞨等古族，10 世纪改称“女真”，12 世纪定族名“满洲”，简称满族。入主中原前后，深受汉文化影响。

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创造了绚烂多姿的中华文化，并不断传承、光大。以文学为例，汉族有《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辉煌；少数民族也有卓越创造，藏族史诗《格萨尔王》、蒙古族史诗《江格尔传》、维吾尔族《阿凡提的故事》、彝族的《阿诗玛》等都是彪炳千秋的杰作。而且，在汉文学精品中，也渗透着少数民族的贡献，汉化蒙古人蒲松龄著《聊斋志异》、满族人曹雪芹著《红楼梦》便是明例。又如医学方面，汉族医术渊深博大，藏医、蒙古医也别具异彩，且与汉医相互启迪、补充。总之，现存 56 个民族，以及迁徙、消亡了的民族（如匈奴、党项、契丹等），都对中华文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释“文化”·“文明”

“文化”是一汉语古典词，又在近代被藉以翻译西洋对应词，从而赋予新的

①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5 页。



内涵。

文化由“文”与“化”组合而成,是“人文化成”、“文治教化”的省称。

“文”原指各色交错的纹理^①,引申为包括文字在内的各种象征符号^②,又具体化为文书典籍^③,文章^④,礼乐制度^⑤,与“武”对应的文治、文事、文职^⑥,与“德行”对应的文学艺能^⑦。又引申为修饰、人为加工,与“质”对称^⑧,与“实”对称^⑨。条理义的“文”,又用以表述自然现象的脉络,组成“天文、地文、水文”等专词,用以表述人伦秩序,则组成“人文”。

“化”,指二物相接,其一方或双方改变形态性质,由此引申出教化^⑩、教行^⑪、迁善^⑫、感染、化育^⑬诸义。

文与化配合使用,首见于《易·贲卦》的《象传》: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此一名论,以天象有“文”(即条理)可循,比拟人伦亦有“文”可循,观察此“人文”(人间条理),用以教化世人,便可成就平治天下的大业。这种“人文化成”的设想,是中华先哲对“文化”的理解,形成一种区别于“神文”倾向的“人文”倾向。

“文化”构成整词,始于西汉末年轻学家刘向的《说苑·指武》:“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这是在与武力相对应的意义上使用“文化”一词。与此相似的用例有晋代束皙的“文化内辑,武功外悠”^⑭。另外还有在与宗教神性相对应的意义上使用“文化”一词的,如南齐王融的“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⑮。总之,作为整词的“文化”,是“文治”与“教化”的合称,已沿用近四百年。而如前所述,包含“人文化成”、“文治教化”内蕴的各种短语、句式,早在先秦多有用例,已传延四百年。

“文化”获得现代义,是在日本人以此词对译西洋术语的过程中开始的。日

① 摇《说文解字》:“文,错画也,象交文。”王注:“错者,交错也,错而画之,乃成文。”

② 摇《左传·昭公元年》:“于文,皿虫为蛊。”杜预注:“文,字也。”

③ 摇《尚书·序》:“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④ 摇《汉书·贾谊传》:“以能诵诗书属文,称于郡中。”

⑤ 摇《论语·子罕》:“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朱熹集注:“道之显者谓之文,盖礼乐制度之谓。”

⑥ 摇《尚书·武成》:“王来自商,至于丰,仍偃武修文。”

⑦ 摇《论语·学而》:“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⑧ 摇《论语·雍也》:“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⑨ 摇《二程粹言》卷员:“理者,实也,本也;文者,华也,末也。”

⑩ 摇《易·乾》:“善而不伐,德博而化。”

⑪ 摇《说文》:“化,教行也。”

⑫ 摇《荀子·不苟》:“神则能化矣。”注:“化,谓迁善也。”

⑬ 摇《礼记·乐记》:“和,故百物皆化。”

嵇康束皙：《补亡诗》。

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诗序》。

本是汉字文化圈的一员，在古代已接受并广为使用包括“文化”在内的成批汉字词。19世纪中后叶的“明治维新”期间，日本大规模译介西方学术，其间多借助汉字词意译西洋术语，而选择“文化”对译英语及法语词“~~悦意~~”便是一例。由此，“文化”在汉字古典义的基础上，注入来自西方的新内涵。这种源于中国的古汉语词，在日本对译西洋术语时赋予新含义的例子，除“文化”外，还有“文学”、“革命”、“共和”、“社会”、“经济”、“自由”、“物理”等一系列关键词，它们又经游学东洋的中国学人逆输入中国。故“文化”等词语在近代经历了“中—西—日”之间的概念旅行。研习文化史，应当留意同一词形所包含概念的古今演化和中西转换，并考察古今变更与中西交会二者间的互动关系。

英文和法文“~~悦意~~”的词源是拉丁文“~~悦意~~”，其原形为动词，有耕种、居住、练习、留心、注意、敬神诸义，以物质生产为主，略涉精神生产，总意是通过人为努力摆脱自然状态。18世纪，英文和法文的“~~悦意~~”（德文对应词为“~~运~~”）词义逐渐由耕种引申为对树木禾苗的培养，进而指对人类心灵、知识、情操、风尚的化育，从重在物质生产转向重在精神生产。

与“文化”含义相近的古典词是“文明”。“文明”之“文”，指文采、文藻、文华；“明”指开明、明智、昌明、光明。联合而成的“文明”，其意为：从人类的物质生产（尤其是对火的利用）引申到精神的光明普照大地，唐人孔颖达疏解《尚书·舜典》“睿哲文明”说：“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孔颖达疏解《易·乾·文言》“见龙在田，天下文明”说：“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有文章而光明也。”便揭示此种意蕴。中国古典也有将“文明”视作进步状态，与“野蛮”对应的，如李渔《闲情偶寄》称“辟草昧而致文明”即为用例。

以“文明”对译“~~精~~”，始于入华新教传教士郭实腊编的中文期刊《东西洋每月统记传》，虽然该刊出现“文明”一词不下150处，但这一译词当时在中国影响不大。明治时期的日本学人在译介西洋术语时，注意了对文化与文明两词的区分，以“文化”译“~~悦意~~”，以“文明”译“~~精~~”。而与“文明”对译的英文词“~~精~~”源于“城市”，表示城镇社会生活的秩序和原则，是与“野蛮”、“不开化”相对应的概念。明治维新的中心口号之一“文明开化”，以及1872年出版的福泽谕吉的名著《文明论概略》，都是在与“野蛮”对应的意义上使用“文明”一词的。福泽谕吉还参考欧洲的文明史观，将人类历史划分为“野蛮—半开化—文明”三阶段。明治间日本有关文明史观的翻译书和日本人自著出版甚多，“文明”成为流行语，吃“文明饭”（西餐）、跳“文明舞”（西式交际舞）、拄“文明棍”（西式拐杖）成为一时风尚。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汪康年等采纳日本这一译词，自19世纪末也多在与“野蛮”“半开化”相对的意义上使用“文



明”一词。如梁启超 1895 年在上海主笔的《时务报》上,便多次出现“文明之奇观”、“外国文明”、“文明大进”、“文明渐开”、“文明之利器”等语。梁氏 1898 年在日本主编的《清议报》,则并用“文明”、“文化”,其与“西洋文明”、“西洋文化”的含义相同。中国人认真区分“文明”与“文化”,始于胡适。胡适 1919 年刊发《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将文明(悦道)定义为“一个民族应付他的环境的总成绩”,将文化(悦道)定义为“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方式”。张申府于同年发表《文明或文化》则称,“文化是活的,文明是结果”。我们今天不一定采用这些定义,但胡、张等先生区分文明与文化两概念,对中国人的文化研究无疑是一种向精确方向的引导。

文化和文明都是人类现象,但二者所涵盖的历史内容又有差异:“文化”的本质内涵是“自然的人化”,人通过有目的的劳作,将天造地设的自然加工为文化。而“文明”则是文化发展到较高阶段,或泛指对不开化的克服(前引诸例即在这种意义上使用“文明”一词);或指超越蒙昧期(旧石器时代)和野蛮期(新石器时代)的历史阶段。进入“文明”阶段的标志有三:文字发明与使用、金属工具发明与使用、城市出现。故中国的文化史长达百万年之久,而进入创制并使用文字和金属工具的文明时代约 1800 年左右。

文化(悦道)作为内涵丰富的多维概念被众多学科所探究、阐发,开端于近代欧洲。这是因为,历经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欧洲人,意识到风俗、信仰、观念、语言都是一个历时性的动态过程。率先开辟世界市场的欧洲人还发现,人类文化呈现共时性的多样化状貌。在这两种批判性观察的激发下,形成了对“文化”加以总体把握和分类研究的诉求。19 世纪以后,文化逐渐成为一个中坚概念,被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普遍使用。比尔斯父子在《文化人类学》中指出:

文化概念是 19 世纪、20 世纪的一大科学发现,其内容是,人类的行为之所以不同于其他种类动物的行为,是因为它受文化传统的影响和制约。这是把“文化”视作人类与动物相区别的标志。英国文化学家泰勒 1871 年在名著《原始文化》中给文化下的定义是:

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

这是被视作经典的广义文化界说。此后,古典进化论学派、文化传播学派、文化功能学派、文化历史学派、文化心理学派、文化结构学派等竞相定义文化。克鲁伯与克拉克洪合撰《文化概念的批判性评注与定义》,列举 164 余种文化定义,归纳为六类:列举描述性的、历史性的、规范性的、心理性的、结构性的、遗传性的。

克鲁伯在《文化的性质》中指出,文化概念的发现,是 19 世纪以来人类学史